

汁宜順順服之立止其花葉陰乾搗為末

服之年白頭盡黑益面紅色仙家重此不盡書其

本主治寒亂泄瀉風氣

病轉筋不止者取枝葉煮湯飲之愈亦去風氣

消痰每欲害亂時但呼其名字亦不可多食損齒

腦下絞痛可以木瓜一片柴葉七枚炙大棗三

中破以水三大升煮取半大升頓服之

不可多食動痰

案經除雲潤肺肉

服食不節多食之計日月漸服食通經

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編

郝春文

主編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

第一卷

郝春文／編著

圖我多喫不宜

多食動風令病發氣發咳嗽

右主治五種痔去三並殺鬼毒惡症

患寸白虫

人日食七顆經七日滿其虫盡消作水即差

按經多食

三升二升佳不發病令人消食助腸胃其茶陶補中

益氣明目輕身

平右主治五邪氣散皮膚支節間風氣能化食

去虫逐寸白散腹中冷氣

患熱瘡為末和猪脂

塗差

和烏蜜治濕癬

和烏酪治乾癬

牛酪療一切虎案經作醬食之甚香美其功尤勝

科學出版社

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編

策劃、主編：郝春文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

第一卷

郝春文編著

助編：史睿 劉屹 朱俊鵬 張華宇

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 第1卷/郝春文編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

(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

ISBN 7-03-009249-X

I. 英… II. 郝… III. 敦煌-出土文物-文獻-匯編 IV. 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 第13816 號

科學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16號

郵政編碼: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廠 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01年8月第 一 版 開本:850×1168 1/32

200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16 3/4

印數:1-2000 冊 字數:324 000

定價:48.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環偉〉)

本書第一至三卷係：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北京市培養跨世紀理論人才「百人工程」研究項目

北京市跨世紀優秀人才工程專項資助項目

本書第一卷承：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

顧問：

寧可

策劃、主編：

郝春文

編委：

柴劍虹、方廣錫、郝春文、李正宇、榮新江、張涌泉
海外編委：

吳芳思 (Frances Wood)、魏泓 (Susan Whitfield)

內容簡介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共30卷，本書係第一卷。此套書以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漢文非佛教文獻為資料來源，將這些數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寫本，全部按號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並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盡可能地解決所涉及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每件文書釋文後附有校記和九十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此書收錄的文獻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族、歷史、藝術、語言、文學、音樂、舞蹈、社會、建築、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前言

郝春文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是《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組成部分和第一期工程。這裏的所謂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是指佛教典籍以外的全部敦煌文獻。對我來說，編著《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想法已醞釀很久。

二十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四萬多件古代文獻，對研究我國中古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族、歷史、社會、民俗、語言、文學、音樂、舞蹈、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但長期以來，與敦煌文獻所蘊藏的豐富文化內涵相比，學術界對它的瞭解太少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僅以唐史的研究而言，不少學者在搜集研究資料時可以遍讀與唐代有關的文獻，却很少有人將敦煌文獻列入自己的閱讀範圍。結果是其他方面的有關材料幾乎被網羅殆盡，唯獨遺漏了敦煌文獻中的相關材料。這是有些非常優秀的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在敦煌文獻發現已過百年的時候，這批材料仍不能為各學科一般研究者充分利用，對它的整理和研究仍局限於少數專門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

這種情況應該說是不正常的。

當然，並不是我們的研究者不想瞭解、利用這些資料，而是客觀條件不允許。衆所周知，敦煌文獻發現以後，大部分先後被掠至英、法、俄、日等國，這無疑爲我國學者全面瞭解、充分利用敦煌文獻造成了極大困難。早年，羅振玉等先輩學者祇能靠伯希和(Paul Pelliot)贈送的少量敦煌文獻照片，或從伯希和處抄錄的部分資料從事整理和研究。二十年代以後，劉復、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等前輩學者又遠渡重洋，赴巴黎、倫敦調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獻。上述前輩學人在非常艱苦、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令人欽佩的研究成果，在調查、介紹敦煌文獻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使國內學者對敦煌文獻的瞭解逐漸增多。但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礙我國學者真正瞭解、充分利用敦煌文獻的主要原因。自五十年代以來，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先是北京圖書館通過交換在一九五七年得到了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漢文文獻斯六九八〇號以前部分的縮微膠片；七十年代，又購得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獻縮微膠片。至此，我國學者已可在國內通過縮微閱讀器查閱大部分敦煌漢文文獻資料。但實際上查閱、利用這批資料的仍限于少數專門研究者。這主要是因爲：其一，上述兩套縮微膠片在國內流傳不廣，除國家圖書館外，全國祇有少數高校和科研機構有條件購置。對多數學者來說，查閱敦煌文獻仍有諸多不便。其二，由於敦煌文獻多爲寫本，

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時期的俗體字和異體字，還有不少寫本使用河西方音。這就要求閱讀某件文書的學者不僅要掌握該文書有關學科的專門知識，還應當對敦煌的歷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獻所需的專門知識有相應的瞭解。否則，即使有條件直接查閱敦煌文獻，在閱讀過程中也會遇到重重困難。這是多數學者在有條件查閱敦煌文獻的情況下也未將其列入閱讀範圍的主要原因。

所以，祇有對敦煌文獻進行徹底整理，將其全部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纔能為一般學者掃除閱讀上的障礙。另一方面，排印的錄校本價格相對較低，為一般研究者所能承受，因而印數可以多一些，流傳得也就可以廣一些。此外，排印的錄校本將原來的手寫文字轉換成規範的繁體字，為讀者解決了因手寫造成的認字問題，從而大大提高了閱讀敦煌文獻的速度。這樣看來，編著《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是將其推向學術界的必要步驟，是一項宏揚祖國傳統文化的盛事。

對佛教典籍以外的全部敦煌文獻進行釋錄無疑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這項工程的啓動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時機。我對這一工程的設想萌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可惜當時條件不夠成熟，時機尚未到來。最大的困難是：當時英藏漢文敦煌文獻的大部分和法藏敦煌文獻的全部雖然均有縮微膠片，但不少膠片攝影技術欠佳。其中英藏部分好一些，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也有一些文字模糊，很難辨識。法藏部分膠片質量較差，模糊

不清者甚多，間有漏拍。顯然，依據這樣的膠片進行全部釋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當時敦煌學界對敦煌文獻的分類釋錄工作剛剛開始，整理、錄校敦煌文獻的方法尚不夠完備、成熟，仍處於探索階段。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所能做的，祇能是一面等待時機的成熟，一面着手進行前期準備工作。

所謂前期準備工作，就是對數十年來學術界研究敦煌文獻的情況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在摸清每一號研究情況的基礎上，編製「敦煌文獻系統研究資料索引」。在北京，比我更早着手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我的好友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我們之所以都要搜集有關敦煌文獻研究情況的信息，實屬事出有因。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學術界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全面展開，每年發表的論文和專著都很多。時至今日，不僅一般學者無法對每號敦煌文獻的研究情況瞭如指掌，即便是專門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也不能憑印象說出每號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另外，對敦煌文獻研究信息的調查，又比我們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時調查有關該課題的研究情況要難得多。其區別在於，對某項課題研究信息的調查，我們可以主要通過查閱書目和論文索引來解決；但對某號敦煌文獻研究信息的檢索，光靠查閱書目和論文索引却不能解決。因為各號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多數不能從書名和論文標題中反映出來。也就是說，要全面瞭解每一號敦煌文獻的研究情況，就必須仔細閱讀全部研究敦煌文獻的專著和論文。也正是由於調查研

究信息所存在的種種困難，纔造成了近年在敦煌文獻研究中重複勞動逐漸增多的現象。爲了使我們的研究避免低水平的重複，盡可能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纔不約而同地搜集有關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起初我們搜集這些信息都是爲了自己研究時參考。對我來說，還有一個潛在的目的，就是在編著《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時，要充分參考這些信息，以便將讀者領到與該號有關的學術前沿。

至八十年代後期，隨着敦煌學的深入發展，現有縮微膠片的質量愈來愈不能適應研究工作的需要。於是，採用先進技術，重拍、精印敦煌文獻圖版本的設想開始在一些學者中醞釀。一九八七年，張弓和宋家鈺先生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的委托，與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達成了重新拍攝、合作編印英藏敦煌文獻中佛經以外的漢文文獻的協議。我有幸被邀參與了《英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工作。當我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次見到重新拍攝的英藏敦煌文獻照片時，心情異常激動。新照片與原來的縮微膠片相比，圖片清晰度大爲提高。原來縮微膠片中模糊不清的文字，現在絕大部分可辨認出來。依據這樣的照片印製的圖版進行文字錄校要比以前依據縮微膠片困難小得多。我當時就意識到，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編著《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設想可以先從釋錄英藏敦煌文獻入手。

但在當時我的前期準備工作尚未完成，而且這樣一個大的科研項目在啓動之初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投入，以供購買、複製必需的參考書和論文，出版的可能性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這樣，我祇能一面繼續準備，一面多方爭取資金和出版方面的支持。

近幾年來，敦煌文獻圖版的編輯、出版情況令人振奮。《英藏敦煌文獻》十五卷已接近出齊，《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和《浙藏敦煌文獻》已經出版。《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也正在出版。這些新出圖版全部印製精良，文字清晰，為敦煌文獻研究者辨識、釋錄敦煌文獻提供了極大便利。但上述版本均定價甚高，不僅一般研究者不敢問津，多數高校和科研單位也無力購置。所以，不少專門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為查閱這些新印敦煌文獻圖版仍不免往來奔波。對一般讀者而言，再清晰的文字圖版也不能解決他們閱讀這些古代寫本本身所遇到的困難。這表明，編輯出版文字清晰的敦煌文獻圖版雖然十分必要，並為編著錄校本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它却不能替代錄校本，無法滿足學術界一般研究者的需要。

適應這種需要，近年陸續出版了一大批敦煌文獻的分類釋錄本。這些分類釋錄本多為作者全面整理、深入研究某類敦煌文獻的成果，既推動了敦煌文獻研究的深入，

又爲學術界瞭解、利用敦煌文獻提供了方便。同時，還爲全面釋錄敦煌文獻積累了經驗。在此基礎上，近年已出現了一些從理論上總結、整理、釋錄敦煌文獻的文章。但分類釋錄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其一，分類釋錄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獻的全貌。由於敦煌文獻的內容極爲豐富，對其進行分類和歸類一直是目錄學家和敦煌文獻研究者深感棘手的问题。在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之後，目前被研究者納入分類整理範圍的仍然祇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大量的文獻沒有解決分類和歸類問題。所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分類釋錄本之和難以包括全部敦煌文獻。其二，目前出版的分類釋錄本很難完備。首先，多數分類釋錄本的作者並未通讀現已公佈的全部敦煌文獻，只是通過各種目錄著作來調查某一類文獻。而現在有關敦煌文獻的各種目錄都是極不完備的，並不能完全反映各類文獻的全部信息。對這些分類釋錄本的作者來說，其釋錄本存在遺漏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應該承認，部分分類釋錄本的作者確實通讀了現已公佈的敦煌文獻，但他們所能見到的仍非全部敦煌文獻。因爲目前敦煌文獻的公佈正在進行之中，如俄藏敦煌文獻目前祇公佈了一部分。所以，這類分類釋錄本仍很難避免遺漏。最後，即使個別分類釋錄者通讀了全部敦煌文獻，他所收集的文獻也祇反映他個人的認識，如果要對某類文獻進行深入的研究，光靠分類釋錄本提供的材料顯然是不夠的。其三，分類釋錄本之間存在交叉和重複。這是因爲，在今天的研究者看來，不少文書具有雙

重性質或多重性質，這就導致了一些文書在已出版的釋錄本中存在交叉與重複的現象。其四，分類釋錄本的質量也不平衡。少數分類釋錄本的作者因缺乏整理敦煌文獻的知識，對敦煌的歷史瞭解不夠，因而在文字釋錄和內容的解釋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最後，分類釋錄還易使人們忽略敦煌文獻的整體性。敦煌文獻就其內容來說雖然涉及許多學科，但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各類文書之間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繫。近年，敦煌學界在分類釋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某些類別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已達到很高水平，而在探尋各類文書之間的聯繫方面則存在明顯不足。這就暴露了分類整理、研究的局限。而《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則正好可以彌補分類釋錄存在的種種不足。可見，分類釋錄雖然很有必要，却不能取代對全部敦煌文獻的釋錄工作。這兩種錄校方式可以共存、互補。

一九九六年春，我的《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至三卷被列入北京市培養跨世紀理論人才「百人工程」項目，不僅獲得了經費資助，還得到了出版資助的承諾。這好比是「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動，《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工程從此開始正式啓動。它的第一期工程就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前三卷。而此時我對敦煌文獻研究信息的調查工作也已經基本完成了。

當然，編著《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首先是因

爲，對敦煌文獻進行整理、釋錄不同於一般的古籍整理。由於敦煌文獻絕大部分是寫本，相當數量殘缺不全，釋錄者不僅需要辨認手寫文字，還要確定文書的性質、名稱、年代等。辨認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閱大量的工具書，另一方面更需要長期工作經驗的積累；而對文書性質、名稱、年代的考證，不但是正確使用文書的前提，也常常是正確釋錄文書文字的必要條件。所以，對敦煌文獻進行整理、釋錄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創作性勞動，這一點雖是所有敦煌文獻研究者的切身體會，但却尚未形成學術界、出版界的共識。直到今天，學術界、出版界中仍有人將對敦煌文獻進行整理、釋錄等同於一般的古籍整理。

從理論上說，整理、釋錄、研究敦煌文獻需要兩個方面的知識，一是整理敦煌文獻所必需的知識，二是被整理的敦煌文獻所屬學科的专业知識。以前，人們比較強調後一方面的知識，這當然是對的。在研究敦煌文獻的早期，整理、釋錄敦煌文獻的方法尚在摸索之中，經驗尚待積累，當時人們首先關心的是對文書內容的理解和利用，對文書文字的釋錄要求並不嚴格。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以王重民爲代表的老一輩敦煌學家憑借他們所具有的廣博知識，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進入八十年代以後，隨着敦煌學的深入發展，整理、錄校敦煌文獻的方法日趨嚴密、成熟，對釋錄敦煌文獻文字的要求也逐漸提高。所以，前一方面知識愈來愈顯得

重要起來。近年出版的一些受到批評的敦煌文獻分類釋錄本，有的就是由該類文獻所屬學科專家錄校，因缺乏整理敦煌文獻所必需的知識，在文字釋錄方面留下了許多遺憾。這表明現在光靠後一方面的知識來整理、釋錄某類敦煌文獻已不能適應學術發展的需要了。

本書的編纂原則是充分運用整理、釋錄敦煌文獻的專門知識，將手寫的敦煌文獻整理、釋錄為通行的繁體字，使其成為各學科一般研究者可閱讀的文獻，為學術界提供準確的、值得信賴的敦煌文獻釋文。同時，盡可能地解決涉及到的文獻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并在每件文書之後著錄近百年來學術界研究該文書的有關論著目錄，為人們使用、研究提供方便。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在工作中一是堅持精益求精的原則，所有文書釋文都與文書圖版、原件作過反覆核查。二是全面吸收以往的釋錄成果和經驗，使每件文獻都能反映出學術界整理、錄校的最新成果。三是多向各學科、各方面的專家請教，以彌補我們在一些學科專業知識的不足。

我們的釋文和已往的釋文不同的地方，酌情用校記說明。有的文書已有多家釋文，難以將諸家不同處一一具列，遇此情況，我們一般祇說明我們的釋文和目前最好的或最新的釋文的區別。由于前三卷的大部分初稿完成於英國倫敦，在那裏不時會出現找不到最好的或最新的釋文的情況，也祇能是能找到哪家釋文就參照哪家的釋文。

本書一至三卷的編纂程序是：先由史睿、劉屹、朱俊鵬、張華宇等分別依據敦煌文獻圖版錄出初步釋文，我在此基礎上依據圖版進行校改、補充遺漏的文書，並撰寫說明、校記、添加參考文獻（史睿和劉屹也撰寫了少量文書的說明和校記的初稿），草成書稿。然後我持此草稿依次核對敦煌文獻原件，據之校改釋文，修改說明和校記，完成本書初稿。初稿完成後，複印分發給各位在祖國大陸的編委審讀，提出修改意見。最後，由我綜合各位編委的意見，完成定稿。

經過幾年的努力，《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第一至第三卷終於完成了，以後我們將每年完成一至二卷。我們的最終目標是，不僅要完成英藏社會歷史文獻的釋錄工作，而且要完成世界各地收藏的全部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釋錄工作。

本書將採用紙質圖書和電子版兩種方式出版，電子版不僅包括紙質圖書的全部內容，還有多種檢索功能，並附有文書原件圖版。

由於此書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再加我們的水平有限，所以在釋文、說明、校記中都會存在錯誤、缺點和不足，我們誠懇地期待着讀者的批評和幫助。

在本書的策劃和編纂過程中，曾得到我的導師寧可先生和周紹良先生等許多學術界長輩和朋友的關心。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領導張文啓同志和首都師範大學科研處的有關領導也一直在支持和關心這個項目。我們不僅能夠時時得到他們的鼓勵和支